

# 论经济学实验方法的适用性与局限性

陈孝兵

**摘要:**传统的经济学研究主要建立在人们受自身利益驱动并能作出理性决策的假设基础之上,长期以来被普遍视为一种依赖于实际观察的经验科学,而不是在可控实验室中进行检测的实验性科学。然而,如今的经济学研究越来越重视修正和测试基础经济理论的前提假设,并越来越依赖于在实验室里而不是从实地获得的数据。经济学的实验方法虽然有它的局限性,但它强化了心理行为因素的影响,昭示着经济学发展的一个新方向。

**关键词:**经济学 实验方法 心理分析 经济人假设

## 一、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与实验方法的拓展

我们知道,经济学一直被认为是一种非实验性的(或“现场观察性”的)科学,随着经济学新的裂变不断发生,传统的方法论基础也在动摇。一方面,经济学的传统假设,尤其是有限理性、纯粹自利和完全自控假设面临着越来越精细的检验和修正,也越来越受到诸多方面的质疑;另一方面,伴随着经济学分析方法的不断细分,社会的、心理的以及伦理道德因素在对人类决定进行的理论与经验研究过程中的影响越来越大,研究成果的形成也越来越多地依赖于从实验室的试验过程获得新的数据,而不是依照传统的方式(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来获得。过去,由于许多经济学家对他们所研究的主题是否是科学或是否开始步入科学行列而感到苦恼,方法论对他们来说是相当重要的领域。实际上,经济学方法论已经成为花费许多经济学家和一批哲学家主要精力的一个活跃的研究领域,成为经济学领域内可以清晰识别的一个分支学科。如今,关于经济学方法论基础的讨论有进一步扩大化的趋势,环境生态经济学、医疗保健经济学、女权主义经济学、传播政治经济学等纷纷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政治经济学的非主流性特征越来越明显。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学早已经不是原生的经济学,由于经济学方法论的多元化趋势,经典的政治经济学传统渐渐离我们远去。经济学倾向于对静态模型进行描述,在平衡状态中解决问题。它假设变化被限制在一系列既定的制度关系下逐渐发生。然而,就像广阔的社会和物理世界不会轻易地受到限制一样,真正的经济实践也不会。均衡仅是结果的一种,渐变只是形式的一种,既定的制度关系也只是许多可能关系中的一种而已。实验经济学的出现与勃兴,使我们相信经济学夸大了布洛克所说的社会的“市场性”。

不可否认,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的研究范式长期以来作为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基础,维护着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权威,即使在有些时候我们模糊了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之间的界限,甚至把两者混淆起来,或者交替使用,也没有动摇这种飞行方法的基础。在几乎每一个人看来,经济学所研究的问题与其自身是极为攸关的,而且是囿于他们自己的经历

与能力的范围之内,这一现象便是人们容忍不断的广泛分歧的根源所在。那些自许为“专家”的人们意见往往很难达到统一,而且我们很难保证他们都是毫无偏见的。在某种程度上,实证经济学的研究结论似乎是、而且确实是与重要的规范问题密切相关的,是与应该做什么及如何取得某一既定目标等问题密切相关的。从原则上说,实证经济学是独立于任何特别的伦理观念或规范判断的。正如凯恩斯所说,它要解决的是“什么是”,而不是“什么应该是”一类的问题。它的任务是提供一套一般化体系,这个一般化体系可以被用来对环境发生变化所产生的影响作出正确的预测。这一体系的运行状况可以通过它所取得的预测与实际情况相比的精确度、覆盖率及一致性等指标来加以考察。当然,经济学所涉及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调查研究者本身就是被调查研究的事物的一部分。与自然科学相比,调查研究者与被调查研究的事物之间更具有本质上的联系。这就使社会科学家得到了一系列自然科学家无法得到的数据的同时,也使社会科学家在实现客观性的目标上遇到了特有的困难。与此同时,规范经济学及经济学的技术也不可能独立于实证经济学。任何政策结论都不可避免地要基于对采取某一种而不是另外一种行动将产生的影响所作的预测,而预测则必须明确或不明确地基于实证经济学。有的学者对这样一种看法提出过批评,即认为在目前的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在毫无偏见的公民之间所存在的有关经济政策的分歧,主要地来源于人们对所采取的行动将带来的经济影响的不同预测,而这些分歧从原则上说是可以通过实证经济学的发展而予以消除的。他们否认人们关于经济政策的分歧是来源于人们在基本的行为准则方面的根本性分歧,是来源于人们在最终可能出现的矛盾双方问题上的分歧。事实上,一个明显的而且并非不重要的事例就是最低生活保障线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我们国家的许多城市都存在着,尽管在形式上人们存在着对这一问题的褒贬纷争,特别是保障线如何确定,很难有一个社会公认的标准,但人们在为所有的人争取到一个“养命钱”这一政策目标上却形成了根本一致的意见。人们的意见分歧主要产生于人们在预测方面的隐含的或明确的分歧,这一预测涉及的是最低生活保障线这一特殊手段在实现目标中的功效

问题。在一定条件下,人们在“正确的”经济政策问题上的一致意见较少地取决于规范经济学的进步,而更多地是取决于这样一种认知:它所得出的结论不仅而且值得受到广泛的赞同,还意味着对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加以严格的区分促进了人们在政策问题上的意见一致。实证科学的终极目的就是要发展这样一种“理论”或“假说”,使之能够对尚未观察到的现象作出合理的、有意义的(而不是老生常谈的)预测。总体说来,这样一种理论是一个由两种元素构成的复杂的混合物,一方面,它是一种“语言”,旨在促进经济系统的、有组织的推论方法,另一方面,它是一系列假说的综合体,旨在从纷繁复杂的现实中抽象出事物的本质特征。

人们认识到实验方法不仅可以应用于经济学,而且还可应用于公共选择理论、公共经济学和政治学等诸多领域的现象,还是得益于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维农·史密斯1971年与同事和好友一同钓鱼时进行的一次卓有成效的讨论。应该说,经济学实验方法的应用始于张伯伦的开创性实验,张伯伦的实验数据显示实验中的实际成交价格与市场均衡理论中所述的均衡价格有偏差,但他本人并未引起重视,也没有把实验经济学当作一个研究工具。首次把实验经济学当作研究工具的是维农·史密斯,史密斯不仅首次阐述了实验经济学的重要性,明确了实验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而且他主持和参与许多经济试验,尤其是用实验的方法检测了竞争价格理论和拍卖理论,并提出设计实验的五项规则,成为实验经济学的真正奠基人。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实验经济学方法仍无法得到主流经济学家的认同,20世纪80年代中期还曾引发一场经济学家与心理学家之间的芝加哥大论战,论战的核心是有关优化和均衡理性选择理论的基本假设,主要参与者有肯尼思·阿罗、丹尼尔·卡纳曼、查尔斯·普劳特、赫伯特·西蒙、理查德·泰勒、理查德·泽克豪泽等人。现在看来,实验经济学就是在可控的实验条件下,针对某一现象,通过控制某些条件,观察决策者行为和分析实验结果,检验、比较和完善经济理论,并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因此,经济学的实验室方法就是给经济学家给定一种直接的责任,即把可控的过程作为生成科学数据的重要来源,而这些过程也可以在其他实验室中重现。正因为实验经济学的研究过程是可控的,也就可能为这种研究提出数据采集过程的严格标准。

史密斯奠定了实验经济学的基础。他将经济分析引入实验室,发展了一系列的经济学实验方法,并为通过实验进行可靠的经济学研究确定了标准。早在20世纪60年代史密斯就发展了经济学领域的“风洞实验”,提倡在实施经济政策前可以先在实验室里进行模拟运作,例如在决定是否放开电力市场、是否对公共部门实施私有化等问题上进行实验等。在史密斯教授看来,历史上,经济学的方法及论题曾被假设为是一种非实验性的学科,它像天文学或气象学,而不像化学与物理学。经济学家通常只用人类偏好及市场供求关系等为基础的假设,力图根据长期观察得出的一些经济结果来理解经济学的作用。但是实际上,经济学与天文学有很大的差别,而正是这种差别性对理解经济学的方法十分有意义。他在1982年发表的《作为实验科学的微观经济体制》一文,统一了此前许多经济实验所采用的个别方法,提出了有关满足有效可控微观经济试验的五项规则,即:(1)非饱和性(报

酬的单调性)。主观行为者严格地愿意增加报酬手段 $u_i$ ( )对于所有的 $i$ 是单调速增的。(2)显著性。参与试验者愿意接受报酬作为重要的行为反映。在实验中,试验参与者行为与其报酬变动有显著性关系,要保证其足以向外界传达信息。(3)支配性。在实验性市场,自己的报酬支配了交易(或其动机)的任何主观费用,如同真实世界作出的经济决策一样,在实验中每人仅获得自己决策应得的报酬。(4)隐私性。在一项实验中,每一位当事人受到仅仅有关他自己报酬的信息。(5)并行性。关于行为和/或制度措施的命题,这些制度措施在一种微观经济中(实验室或现场)进行过检验,也适用于其他微观经济(实验室或现场)。其中类似的其他情况均相同。史密斯强调,每一个实验都应由三大元素组成:环境、体系和行为;环境给定了每位参加者的偏好、初始的货品禀赋和现有的技术水平,而体系则界定实验术语和游戏规则;环境与体系都是可控制的变量,最终会影响所观察的行为。有了这些条件,实验经济学就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了。

在史密斯教授实验经济学的开拓性研究中,不确定性下的个人偏好及市场行为是该研究最为重要的方面。后来,它发展为把个人偏好的实验研究扩展到了测量负所得税,以及其他因素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及对电力、住房及医疗服务的需求上,从而使整个经济学研究建立在对市场行为的研究上。目前,在产业组织理论和反托拉斯经济学中,实验性方法已应用在检查垄断、合谋及有关反竞争性措施的影响,以及自然垄断及它对于规模经济、进入成本、可竞争的市场假设的关系等市场行为的研究上。而且,作为一种一般的经济学研究方法,以实验方式来把握人的市场行为,就可以从根本上了解现实经济中发生了什么。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经济学的实验方法为研究人的经济行为提供了一种可观察的途径。

经济学所采用的实验设计是以人为研究对象来支持与反驳经济模型和理论的预测能力的,这些实验已经被用来与博弈论的方法(即纳什均衡)进行比较,解释经济决策者(实验中的研究对象)的行为。比如说,博弈论表明纳什均衡对于自愿贡献的公共物品所提供的方案是等待“搭便车”,因此不要为公共物品进行奉献。而实验经济学家则允许经济学家判定这一均衡是否与人类行为相一致。另外,经济实验还被设计成能够测试经济模型中消费者和生产者假定的方法,参与研究的学生们可以选择一个经济模型或博弈模型,并且利用见习船员扮演代理人的角色来设计一个实验。这些实验结果将要进行分析,通常采用统计方法,并且要与理论模型所预测的结果(或假定)进行比较。在史密斯看来,以往经济学理论都是未经试验检验过的理论,这些理论仅仅是一种假设,它被接受或被拒绝的基础是权威、习惯,或对于假设的看法,而不是基于一个可以重演的严格证实或证伪的过程。而经济学的实验方法可以把可论证的知识引入经济学领域,使人们了解真实的市场运作模式,同时,实验中的可控过程也是生成科学数据的基础。而传统经济学仅以政府及个人所收集的数字进行研究,其科学性也就值得怀疑。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家强调理论服从经验检验的重要性,但他们只按照他们断言的方法论准则行事,常常无视其预测能力和对解决政策问题的意义,事实上或许是以“无关痛痒的证伪主义”为特征的。与此相反,为了达到经济学科的科学性,史密斯教

谈及不少研究者从 1956 年开始进行了几百次市场行为的实验,并试图通过模拟市场交易、改变市场交换制度、观察实验人员的决策行为等,不仅从中引申出市场运作的条件、交易持证、交易制度规则,并且对传统的经济理论重新进行评价。

## 二、经济人假设的不确定性与实验方法的局限

从一点意义上说,实验方法引入经济学研究的倾向,动摇了传统经济学赖以继的方法论基础,这同人们对“正统的”经济理论作为一种“非现实主义的”理论所进行的旷日持久的批评是有些直接联系的。曾几何时,经济学是一种“沉闷无趣的”科学,因为它假定人是自私的和唯利是图的,人是“欢乐与痛苦的计算器”,且其计算速度如闪电一般。“经济人”这架计算器,就像一粒充满着幸福渴望的水珠一样,在某些使它游离于幸福与痛苦之间的动因的作用下,振荡不已,总是处于“一种连续的警觉状态”,一旦它们那敏感的直觉嗅察到了供给与需求状况的变化,它们将立即改变价格或改变定价原则。不过,这种灵敏的价格反应,是建立在假定市场是完美的,竞争是纯粹的,而且商品、劳动力与资本等都是同质的基础之上。

很明显,任何一种有意义的科学假说或理论都意味着某些力量在理解某一特定种类的现象中是重要的,而另外一些力量则是不重要的。一般说来,进行理论研究的方法不止一种,亦即对理论进行表述所依赖的“假设”体系不止一种。对假设所作的选择,通常是出于下述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它们在表述该假说方面的简便性、清晰性及准确性;二是它们带来间接证据的能力,特别是假设可以使人们联想到该假说的某些含义已经可以为观察所检验;假设可以导出该假说与其他一些解决相关问题的假说之间的相互联系,等等。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不管什么理论都不能通过直接地将其“假设”与“现实”加以比较来进行检验,因为事实上并不存在任何一种进行该种检验的有效方法,完全的“真实性”是无法达到的。而某一理论是否“足够”真实这一问题,只有通过考察该理论所取得的预测,对于我们所要解决的问题来说,是否是足够令人满意的,或者是否是比来自于其他假说的预测更令人满意来作出回答。与此同时,任何理论还是可以通过其假设的真实性来检验的,而不必考虑其预测的准确性,尽管这种看法并不为大众苟同,甚至还受到大多数人的责难,并成为经济理论因其非现实性而遭受批评的根源所在。

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和决策,是经济学采用实验方法的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之一。传统经济学假设市场行为主要由物质动机来推动的,而经济决策是由自利和理性所控制的。卡尼曼和其他心理学家利用实验和调查对人类行为进行大量研究之后,认为在真实的世界里,决策者们经常不是理性地根据概率去评价不确定事件,也不是根据预期效用函数作决策。他们的研究表明,人们在面临未来的不确定性时,通常没有能力充分分析复杂的决策形式,相反他们的判断往往依赖于自发性和拇指规则。卡尼曼和塔特维斯基在几次试验中阐述了自发的效能。在特定的场景下,试验主体被要求在对某人给定描述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划分,例如是商人还是国会成员。在给定人群中随机抽取一人,对其描述,诸如“对政治学有兴趣、喜欢参与讨论和热衷于在媒体上露面”后,即使在被告知商人在人群中占有更高的比例后,大多

数主体仍然认为此人是国会成员。另外一种偏离概率判断的是拇指规则,即人们的判断经常依赖于熟悉和可用的信息,因为这些信息更容易从记忆中获得,而且往往被认为是真实和相关的。

从这种实验中导出的这种间接证据,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持有不同背景的人,在对某一特定假说的信任程度上的差异。例如,让我们来考虑这样一个假说:在某一特定地区或行业内,在就业问题上所存在的种族或宗教歧视,与该地区或该行业中的垄断程度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如果该行业不是垄断性质的而是竞争性的,那么,只有在就业者的种族或宗教影响到其他就业者与他们一起工作的合作性,或影响到消费者对他们所生产的产品的接受性,而与雇主的偏见毫不相关时,才可能存在较为严重的种族歧视。经济学是致用之学,在 20 世纪,经济学更多地介入了政策,更多地深入到经济运行的实践之中,而不是再重复从理论到理论、从假设到结论的论证,通过大量的实证分析,给予政策行为更多的理论支持。这并不是说,经济学用一些并不存在的假设得出并不存在的结论这样的现象不存在,而只是研究手段的限制使得不可能把假设建立在完全的实践的基础上,同时作为理论分析,重要的是抓住经济问题的根本,所以假设的不完备并不应该成为经济学受到诘难的理由,而只有“捏造”假设的才是批判的对象。经济学对经济现象的变化作出迅速的反应本无可厚非,但由于经济问题的多变及经济理论与经济现实天生存在的时滞,使得急于求成式的经济评论往往显得幼稚。因为,时尚是经常变换的,对时尚的过分追逐结果往往是被时尚所愚弄。有些经济学者凭借他们对经济学的特殊感悟,经常对经济问题作出预测,这也是一种时尚。经济学不能拘泥于形式,不能过分追求外在的包装,而是要解决实际问题。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中绝大多数都与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相关,即使是从事抽象理论研究的经济学家,他们的成就对解决现实问题也不无意义。

从这种意义上讲,某一假说的合理性本身并不足以作为对其他假说进行取舍的标准。人们可以观察到的事实在数量上必然是十分有限的,但可能的假说却是无限的。如果存在某一种假说与可得证据相一致,那么一定还有无数的假设也与这一可得证据相一致。例如,假设对某一特殊消费品所征收的一种特别货物税,导致了价格的上涨,其上涨幅度完全等同于税收的数量。这与竞争情况下稳定的需求曲线或水平稳定的供给曲线是一致的;但它也与竞争情况下需求曲线或供给曲线发生必要的相应移动后的斜率为正或为负的供给曲线相一致;它与垄断情况下的边际成本及稳定的需求曲线相一致,等等。这一假说所适应的另外一种证据可以起到剔除上述某些可能情况的作用,但它绝不可能把这些可能性削减为一种,而独自地与这一有限的证据相一致。我们同意这样的观点:对选择所进行的考虑应以“简洁性”与“有效性”为出发点,但这两条标准的本身就意味着否定完全的有目的的简化,因为理论越是“简单明了”,在某一既定领域内对现象进行预测所需要的初始知识也就越少;理论越是“富有成效”,它对现象所作的预测也就越精确,而且该理论进行预测所依据的范围也就越大,同时,为了进一步研究的需要,它所加以说明的东西也就越多。实验经济学去年获诺奖对它融入主流经济学显然是一个好兆头,但是它们真的

有用吗?结论真的可靠吗?它们的研究成果和结论与现实一致吗?这样一系列的问题都是我们必须十分关注的。对经济学采用实验的方法,我们也听到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最经常提出的疑问是认为这种方法是人为的、过于简化的和不现实的,所受到的局限太多。这种方法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实验是人为的,是有意地像人们所希望的那样、经过人工雕琢设立的,它很难解决这样一些重要的问题,例如,实验的目的是什么?这一目的有何价值?实验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这一目的?如果目的是要验证理论的某些方面,那么,就其任务而言,只要实验设计得恰当,简化就是优点而非缺陷。这些实验大多要求参加者对相对直观地涉及一定实际的金钱和可能性的问题作出决策。如果预期效用理论一个或更多的定理在如此合意的条件下失效,则其作为在风险和不确定性条件下个人决策一般理论模型的效力就值得怀疑了。如果在这些简单情况下实验结果与基本定理产生实质性、系统性的背离,那么,在更为复杂的情况下,让我们如何相信其有效性呢?海因纳和史密斯的相关看法很有见地。在海因纳那里,许多市场实验是通过能够给参加者以精确、排序明确的偏好数据表来引出需求和供给,但在“现实中”,许多人对自已的偏好的认识远不是精确明了的。海因纳承认,某些实验纳入了一种不确定性因素,但他认为还远远不足,因为它所涉及的是由实验者设计的、受控制的不确定性,而非人们有关自己偏好的内在不确定性。史密斯本人也承认,有必要对传统理论的基本假设加以验证,但他认为,实验方法完全可胜任验证这些重要问题的任务。

第二,由不熟练参加者产生的实验结果的有效性。由学习产生的较高经验水平,即使在既定实验环境下,不同类型的参加者是否表现出显著不同的行为模式,也能显著地改变可观察的行为吗?例如,伯恩斯用两类参加者进行了相同的拍卖实验,其中一组是“没经验的”大学生,另一组则由一些“老练的”专业羊毛商组成。令人惊奇的是,在盈利方面,学生们比专业商人做得好。这促使伯恩斯进行了后续的研究,他就商人们为何在实验中那样做的问题对商人们做了访谈,结果表明,商人们把为适应其职业生活环境而养成的行为模式带到了实验之中,而这种行为模式不能适应与现实有很大差异的实验市场条件。这个案例对实验的批评者和支持者而言均有意义:批评者们会认为,它进一步证明了由学生参加者在简化的环境中产生的实验结果“毫无意义”;支持者们会指出,一项比较性实验研究加上恰当的后续研究,有助于揭示实际的商人在“真实的”市场中为长期生存而采取的决策程序。这样的争论无疑还会继续下去,因为迄今为止的迹象表明,这种争论是有益的。一方面,怀疑论者细致的批评性审视对实验结果的可靠性和有效性提供了一种有用的检验,并促进了实验设计的改进。另一方面,可以预见,越来越多的经济理论和实践领域受到日益先进的实验研究的检验,能产生一种其他任何研究方法不能产生的新启示和新思想。

第三,由于现成可用资料的缺乏,经济学家很少具有实验程序方面的经验无疑构成了一个障碍,如果实验应用的范围和影响继续增大,应用方面的失误也会越来越多。人们认为经验有助于消除偏差,这一观念使人们对那些以没有经验

的主体为对象的实验产生怀疑。因而,1982年坎内曼和特维尔斯基以一些老练程度不同的主体为对象进行过实验,来验证经验知识是否能减少和消除偏差。实验的结果是否定的,它并没有完全支持那种认为经验丰富的专家能正确处理问题以及现实中人们能吸取教训的观点,实验中虽然许多人熟知应付某些事件的一般性原理,可是当这些事件出现时他们却没有应用这些原理,而导致对这些事件处理的失败。不过,我们对社会科学中某一特殊预测所作的检验,很少能够通过这样一种实践来进行:这种实践是经过专门设计的,意在消除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干扰因素。通常,我们不得不依赖于偶然发生的“实际情况”所提供的证据来进行我们的检验。更何况,社会科学中无法进行所谓的“有所控制”的实验,这并不能反映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根本区别,这既是因为“无法控制”的实验并非为社会科学所特有(自然科学中的天文学就是一例),又是因为有控制的实验与无控制的实验之间的差异充其量不过是一个程度上的差异,没有哪一种实验是可以完全控制的,同时每一种实验中又都存在着部分的控制,这是因为某些干扰因素在整个实验过程中应保持相对的稳定。

M 弗里德曼曾告诫我们,经济学作为一门实证科学,是一种暂时被接受的、关于经济现象的概括体系,这一概括体系可以被用来对情况变动的影响作出预测。人类在扩展这一概括体系,增强我们对其合理性的信赖,及改进其预测的精确程度等方面所取得的进步,受到了下述两种因素的阻碍:一是所有知识探索的人类能力方面的有限性;二是社会科学中所存在的种种桎梏。这些桎梏对于一般性的社会科学来说影响极大,而且对于作为社会科学的一种的经济学来说也特别重要。前面我们说过,经济学的中心议题对日常生活及对公共政策中大部分问题的重要性寄予了太多的热情,从而妨碍了经济学的客观性,并造成了科学分析与规范判断之间的混淆。特别是依据未经控制的实践而不是依据受到控制的实践的必要性,使得为证明试验性假说的可接受性而创造大量的、准确的证据成为困难,虽然对未经控制的实践的依赖并不影响这一基本的方法论原则:如何假说唯有通过它的含义或预测与可观测的现象之间的一致性才能够得到检验,但是,这种依赖确实使得检验假说的任务更为艰巨,且使得在所涉及的方法论原则方面出现了更大程度的混乱。经济学的实验方法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局限性,不仅在于其年轻,而且在于其中都渗透了太多人为的因素,它们能否真正地反映真实世界的状况是十分值得质疑的。还有,利用实验方法的研究尽管开辟了一个新视野,但是实验的设计总会舍弃很多真实环境,而且实验者的人为性与真实的经济行为往往相去甚远。这样,运用其得出的结果来观察现实的经济行为会有许多不可靠性。但是,不论实验经济学有多少不足与缺陷,去年把诺贝尔奖颁给它们,就是对它们的认可,是让这些理论进入主流经济学的一种方式。至于它们对主流经济学的影响与冲击到底有多大,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不仅为主流经济学的未来发展增添了活力,让人们重新审视和反省主流经济学,同时,也为实验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

### 三、实验方法的现实性影响

科学的东西内含的一个基本假说就是:现象是具有欺骗

性的,而且我们可以通过某种方法而对证据加以考察、解释或组织。从这些证据中我们将发现那些表面上互不相关、各不相同的现象事实上却是一种更为基本且相当简单的结构的表现形式。而且,对这一假说加以检验的标准,同其他假说的检验标准一样,是它所取得的成果。如果某类“经济现象”看起来好像是变幻莫测、纷繁复杂的,那么我们只好这样假定:这是因为我们没有适当的理论来对它们作出解释。我们决不可能把已知的事实放在这一边,而把“与现实紧密结合的”理论放在另一边。理论是我们透视事实的桥梁,如果没有理论,我们将不能透视事实。假说的创立是一项精神、直观与发明的创造性活动,其实质就是要在众所熟知的材料中发掘新意。方法论能够做的是,提供接受或反对某种研究框架的准绳,制定帮助我们区分鱼目和珍珠的标准。

20世纪中后期以来,西方(现代)经济理论的演变中出现了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即经济研究的领域与范畴逐渐超出了传统经济学的视野,作为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经济学假设与分析方法日益受到质疑和挑战,经济分析的对象延伸到几乎所有的人类行为。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流 and 相互渗透得以拓展和加深,经济学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许多交叉学科和边缘学派,例如,心理经济学、地理经济学、新经济史学、混沌经济学、不确定性经济学、信息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等。特别是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实验经济学对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产生了日益广泛的影响,虽然实验方法并不可能取代实地观察和研究,但正如普劳特所指出的那样,应用于实地研究的理论和模型必须包括许多对假设、参数和行为的判断。在实验室研究的简单情况可以为我们提供评估这些判断之重要性的数据。经济学是少数几个幸运的学科之一,可以同时在地现场和实验室加以分析研究。在社会经济生活千变万化的同时,要经济学回到古典意义上去,停下裂变脚步,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知道,20世纪的经济学仍然是建立在物质经济极大推进的基础上的,这种推进是依靠无法满足的物欲作为推动力量。经济学讨论的是我们身边真实的生活,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在商店里,当通货膨胀出现时,所有的人都受到冲击;当经济萧条袭来时,巨浪会打翻所有的船只。早行觅食之鸟尚且需要了解食虫的供给与需求状况,依靠有限的退休金来维持生活的老人、决心献身于社会改良的年轻的理想主义者,当然也都离不开经济学。当我们不断地关注经济学该向哪里发展、该如何发展时,我们也发现经济学更加神秘而富有吸引力。科学是没有国界的,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经济学。在20世纪后半叶出现的经济学的调整期,经济学从书斋走进实验室,不仅使原来的经济学家成为经济学改革的主流,而且非经济学家对此也抱有极大的兴趣,使得经济学成为人人关注的话题。我们生活在一个变化得这样迅速和动荡的世界里,是人类有生以来千百年来所未曾见过的。今天自认为是事实的东西,明天可能会被证明为是错觉,人们据以生活的许多真理,在一个新的参考系统中也许不得不承认是一种幻觉;虽然我们在使自己的神经系统适应不同的环境方面可能会感到困难,但是现代的世界的确正在不断地改变旧的参考系统。让经济学家对实验方法拥有更多的经验、更深刻的理解,其意义远不只是让他们在学术研究中使用这些方法,过去已经做过的大量基本上不属于经济学实验的实验,却具有

实质上的经济和社会福利含义。例如,在美国,每年在医疗卫生领域都有大量的实验研究(有时称随机控制测试),这些实验研究有可能导出对社会稀缺资源的使用及对人们生活质量和寿命有重要意义的决策。

要评价经济学的实验方法及其影响,决不能忽视道德意识形态因素的制约,因为任何科学实验是由个体的人来控制的,人思维着的大脑必然受到个人道德意识的支配。实验是一种行为方式,这种方式通过提供给人们一种“世界观”而使行为决策更为经济,同时它不可避免地与人们有关世界是否公平的道德和伦理方面的评判交织在一起,一旦人们发现其经验与它不符,人们就会试图改变其意识形态,甚至改变实验得以进行的各种假定前提。显而易见,道德规范不仅对“经济人”的行为产生影响,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着实验的科学效果。连米尔顿·弗里德曼这样极力推崇实证经济学分析方法的经济学家也承认,经济学家不仅是经济学家,他们同时也是人,所以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念毫无疑问会影响到他们的经济学。无价值的经济学只是一种理想,经济学家的价值判断无疑会影响到他所从事的研究课题,有时也许还会影响到他所得出的实验结论。纯科学的经济学以后是否会出现,我不能武断地否定,但这种经济学从来就不曾存在过。就说今天流行的新古典经济学,也决不是超时空地“科学着的”,它浸透了市场社会的道德判断。今天经济学家所做的一切,在基本道德判断上与19世纪的戈森、杰文斯、门格尔、西奇威克、埃奇沃思等功利主义思想家的道德判断并无本质区别,只是预设了许多假定条件,实验的数据更全面、更直观,理论分析的手段与方式更加精致而已。理论和经验测试之间的密切关系,有助于改善和提高理论分析和经验研究的实际效果。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那些关心社会问题的经济学家们把实验的方法应用到社会学、法律、政治科学、历史、人类学和心理学方面,经济学的发展会获得广阔的空间,特别是有关个人理性选择、社会福利水平和社会稳定系数的分析会如虎添翼。

#### 参考文献:

1. 约翰·海 主编:《微观经济学的前沿问题》,中文版,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
2. 湛志伟:《坎内曼与塞勒对行为经济学的贡献》,载《经济学动态》,2003(1)。
3. 易宪容等:《观察人的经济行为何以可能?——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思想评述》,载《国际经济评论》,2002(6)。
4. 栾天虹:《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理论述评》,载《浙江社会科学》,2002(6)。
5. 陈孝兵:《经济学的前景》,载《学习与探索》,2002(5)。
6. 杨玉成:《穆勒问题和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载《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1(9)。
7. 布赖恩·斯诺登、霍华德·文:《与经济学大师对话:阐释现代宏观经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8. A.S. 艾克纳 主编:《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中文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9. 王宏昌 编译:《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讲演集》(1987-1992),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作者单位: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武汉 430077)

(责任编辑:IN)